

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理论丛

主编 刘 欣

吴 菲 著

幸福感三问

来自中国的经验发现与
机制解释

THREE INQUIRIES
ABOUT SUBJECTIVE WELL-BEING:
Empirical Findings
and Mechanisms from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论丛

主编 刘 欣

幸福感三问

来自中国的经验发现与
机制解释

THREE INQUIRIES
ABOUT SUBJECTIVE WELL-BEING:
Empirical Findings
and Mechanisms from China

吴 菲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感三问：来自中国的经验发现与机制解释 / 吴菲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6

(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理论丛)

ISBN 978 - 7 - 5201 - 4579 - 4

I. ①幸… II. ①吴… III. ①居民 - 幸福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4710 号

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理论丛

幸福感三问

——来自中国的经验发现与机制解释

著 者 / 吴 菲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杨桂凤

文稿编辑 / 马甜甜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群学出版分社 (010) 5936645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75 字 数：202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4579 - 4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为 201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新时代中国的收入分配与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研究”
(18CSH052)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新时代的经济福祉与社会福祉	1
第 2 章	半个世纪的“幸福感悖论”：缘起、争辩与证据	9
第 3 章	社会地位抑或社会距离？ ——多层次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	34
第 4 章	工作领域的社会比较 ——参照群体及收入增长预期的作用	56
第 5 章	家庭内的社会比较 ——夫妻间相对经济地位与婚姻满意度	88
第 6 章	检验多重参照群体框架 ——以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为例	118
第 7 章	永无止境的跑步机？ ——生命事件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动态分析	146
第 8 章	结论 ——寻找一条幸福的发展之路	163
参考文献		169
后 记		193

表目录

表 2-1	单变量描述统计（CGSS 2003 ~ 2013）	20
表 2-2	Log（人均家庭收入）与个人幸福感的 关系：序数 Logit 模型估计值	24
表 2-3	Log（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省级幸福感的 关系：OLS 模型估计值	26
表 2-4	Log（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化与省级幸福感变化的 相关：时间序列数据 OLS 模型估计值	29
表 3-1	不同地理层级的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影响： 文献整理	40
表 3-2	两个原则所预测的不同地理层级收入不平等幸福感效应的 异质性示意	43
表 3-3	各地理范围的收入不平等分布	46
表 3-4	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单变量统计值分布 （ $N = 50572$ ）	47
表 3-5	不同地理范围的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序数 Logit 模型估计值	49
表 4-1	“未来收入流动预期”跃迁矩阵：1 年间隔	70
表 4-2	单变量描述统计（CGSS 2003 ~ 2013）	71
表 4-3	不同参照群体收入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 （CGSS 2003 ~ 2013， $N = 56777$ ）	74

表 4-4	工作参照群体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主观收入预期的作用（CGSS 2006， $N=6858$ ）	76
表 4-5	参照群体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客观未来收入的作用（CGSS 2003 ~ 2013， $N=56782$ ）	78
表 4-6	相对收入地位对幸福感影响的情境测量具体设计	80
表 4-7	样本基本变量分布对比：顺德 2011 年调查与 CGSS 2011	81
表 4-8	经济背景及相对收入地位对情境幸福感的影响：基于顺德 2011 年调查的 OLS 模型（ $N=865$ ）	84
表 4-9	参照收入对情境幸福感的影响：基于顺德 2011 年调查的 OLS 模型（ $N=865$ ）	85
表 5-1	单变量描述统计（CGSS 2006）	100
表 5-2	夫妻间相对收入对个人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101
表 5-3	家庭总收入如何形塑相对收入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104
表 5-4	夫妻间相对职业声望对个人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105
表 5-5	相对经济地位与婚姻满意度：情境题设计	108
表 5-6	样本基本变量分布对比：2014 年网络调查与 CGSS 2013	109
表 5-7	相对收入对个人情境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主效应及异质性	112
表 5-8	相对经济地位对个人情境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不同维度的异质性	113
表 5-9	相对经济地位对个人情境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已婚样本及未婚样本	114
表 6-1	单变量描述统计：2012 年中国民生指数调查	130
表 6-2	农民工身份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全样本（ $N=30393$ ）	133
表 6-3	多重参照群体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农民工样本（ $N=4392$ ）	135
表 6-4	相对经济地位能否解释农民工身份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全样本（ $N=30285$ ）	139

表 6-5	对未来的期望是否压抑了城市就业居民平均收入对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效应：农民工样本 ($N=4358$)	141
表 7-1	生命事件分析样本筛选示例	152
表 7-2	分析涉及的各生命事件样本量 (CFPS 2010 ~ 2016)	153
表 7-3	收入变化对主观幸福感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适应效应和期待效应	157

图目录

图 2-1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变化趋势	22
图 2-2	中国人均 GDP 与幸福感的变化趋势	22
图 2-3	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省级幸福感的关系： 2003 ~ 2013 年分样本估计	27
图 2-4	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省级幸福感的关系： CGSS 2010 样本估计	27
图 2-5	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长期变化与省级幸福感长期 变化的关系（CGSS 2003 ~ 2013 样本估计）	30
图 3-1	不同地理层级的收入不平等对个人主观幸福感 影响的比较	53
图 4-1	参照群体收入对个人幸福感影响的路径	64
图 4-2	参照群体平均收入对个人幸福感影响的主效应	65
图 4-3	参照群体收入影响个人幸福感的机制	65
图 4-4	情境准实验补充分析	66
图 4-5	顺德调查中情境幸福感分布	83
图 5-1	不同理论对于夫妻间相对经济地位效应的预测	96
图 5-2	夫妻间经济地位不平等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总体路径图	98
图 5-3	相对收入对婚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	102
图 5-4	2014 年网络调查情境婚姻满意度分布：相对收入	110
图 5-5	2014 年网络调查情境婚姻满意度分布：相对职业声望	111

图 5-6	相对收入对情境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家庭总收入的形塑作用	114
图 6-1	参照群体收入影响个人生活满意度的两条路径	125
图 7-1	物质领域生命事件发生前后的主观幸福感：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	159
图 7-2	非物质领域生命事件发生前后的主观幸福感：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	160

第1章 导论：新时代的经济福祉与社会福祉

第一节 主观幸福感：民众福祉的晴雨表

长期以来，幸福被视为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之一。早期的哲学家如边沁就曾提出，所谓好社会，就是要满足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十多年来，各国政府也开始将普通民众的主观幸福感纳入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体系中。无论是2009年由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等经济学家执笔的《法国社会发展报告》（Stiglitz, Sen and Fitoussi, 2010），还是不丹推出的“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都暗示了一种社会进步观的转折：从单一地重视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水平的提高到关注民众对于经济增长的主观感受。不仅如此，我国政府更是将“人民幸福”明确列为小康社会的要素。显然，理解经济福祉与幸福感所代表的社会福祉之间的关系，是构建综合性民众福祉指标的重要条件。与公共领域对幸福感的重视相呼应，自70年代中叶开始，关于财富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引起了社会科学各领域越来越多的关注（Diener and Biswas-Diener, 2002；Easterlin, 1974；Firebaugh and Schroeder, 2009；Kahneman and Deaton, 2010；Stutzer, 2004）。

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财富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大多围绕两个悖论[“收入－幸福感悖论”（又称“伊斯特林悖论”），以及“不平等－幸福感悖论”]展开。“收入－幸福感悖论”由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在1974年提出，核心论点是：尽管短时期内财富越多，幸福感也越高，但长期以来，财富



的增长并不能对幸福感的提高起到显著作用（Easterlin, 1974）。随后针对该悖论涌现出大量研究，一部分研究聚焦于验证收入 - 幸福感悖论是否存在，另一部分研究试图解释该悖论。在伊斯特林的经典研究发表的同时，另一位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了“隧道效应”（Hirschman and Rothschild, 1973），指向了另一个悖论——不平等 - 幸福感悖论，即在一些经济发展初期的南美国家，尽管出现了较高水平的不平等，然而民众却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容忍度，其幸福感并未如意料中那样降低。长期的经济增长究竟是否能显著提高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多大程度上的不平等是能够被容忍的？宏观层面的不平等、经济增长以及个人层面的主观幸福感之间有怎样的交互关系？这些问题将引领本书的讨论。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按照全国代表性调查样本的估算，中国在 2015 年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 0.5，高于国际警戒线水平（Xie and Zhou*, 2014）。在快速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变迁仍是一个需要经验数据准确呈现的问题。这对于以民为本、将人民的主观幸福感评判纳入我国社会发展的衡量体系中具有指导意义。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因而政府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此外，又强调新时代主要矛盾已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幸福感作为获得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民生福祉的重要指标，又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需求的外显表达；而收入不平等则是衡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维度之一。因而，在新时代背景下，讨论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及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政策意涵。

第二节 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 两个悖论

一 悖论之一：收入 - 幸福感悖论

自经济学家庇古以来，经济学就清楚地区分了社会福祉及经济福祉，

认为大众的幸福感评判和客观的经济增长指标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两个维度。然而，即便如此，经济学家们一直持有一种预设，即社会福祉和经济福祉应该是朝同一方向变化的（Easterlin, 1974）。1974年，伊斯特林首次以经验分析验证了这个经典假设，并提出了著名的“收入-幸福感悖论”（Income-Happiness Paradox）。他就幸福感和财富的关系进行了三组比较，基于跨国数据经验性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家内短期比较，在一个社会内部，那些收入更高的人群的幸福感显著高于收入更低的人群的幸福感；二是国家间短期比较，在不同国家之间，拥有更高人均生产总值的国家，其居民的平均幸福感也更高，但这种正向相关并不像个人层面收入与幸福感的正向相关一样明确无误；三是国家内长期比较，他使用以国家为单位的长期追踪数据，发现至少对美国而言，1963~1970年，国家的收入均值变化与幸福感的变化并不吻合：尽管收入均值明显上升，但居民的平均幸福感并没有呈现同样的增加趋势。伊斯特林在随后的研究中，将“幸福感悖论”的意义表述为“短时期内，无论在国家间抑或是国家内，幸福感与收入有直接相关；但长期内，当一个国家的收入增长时，幸福感并不会增长”（Easterlin et al., 2010）。该悖论点燃了社会科学界对于幸福感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热情。近年来，随着数据可及性的提升以及分析方法的改进，仍然不断有新的实证研究涌现，但对于“幸福感悖论是否成立”这一问题，依然充满争论（Clark, 1995; Easterlin, 2015; Veenhoven and Vergunst, 2014），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变化在长期内是否有显著正向相关。

二 悖论之二：不平等-幸福感悖论

与传统所认为的“不平等一定有损”的观点不同，赫希曼在70年代观察到拉美国家民众对于快速增加的收入不平等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容忍”，并提出了著名的“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作为解释：在经济快速增长或未来不确定的时期，个人透过移情其他与自己相似的群体产生一种“红利”，可以使社会在维持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的同时，因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hope factor）而不至于引起不满和抗争（Hirschman and Rothschild, 1973）。怀默霆在研究中国民众的公平感时提出了“社会火山”（social vol-



cano) 迷思,也可以看作另一种形式的民众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容忍,那些处于社会分层体系较低位置的群体,反而并非不满程度最高的群体(怀默霆,2009)。这种客观相对位置与主观评判的不一致构成一个悖论,而要提出有效的解释,不仅仅需要观察个人过去与未来的收入变动,更要对于其形成幸福感评判时采取的参照群体做一番详细的考察。

第三节 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 三个问题

关于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与民众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三个问题处于学术探讨的核心位置。问题一:经济增长水平与民众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如何?国家更富裕是否一定意味着人民更幸福?这也是“幸福感悖论”探讨的主要问题,它不仅涉及在短期内国家之间的比较,也涉及一个国家在较长时期内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和幸福感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收入不平等是否会减损民众的幸福感?与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不平等加剧是否会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评判产生负向影响?是否存在“不平等的诅咒”,即财富分配的不均带来的负面效应甚至会超越财富整体水平上升带来的正面效应?问题三:个人过去的经历和对于将来的期望是否会影响其当前的幸福感?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都存在于不断变动的历史中,除了当前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处的位置外,个人的过往经历以及对于未来的期望也可能会对其当下的主观幸福感评判产生影响。

这三个问题并非各自独立: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变化本身就是同时发生的,因而它们对于民众幸福感的影响也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可能互为条件,产生一些调节情境。而个人过去的收入变化和对未来的收入增长期待也在很大程度上嵌入宏观经济背景中。因而,不应将这三个问题割裂开来,相反,探究这三个问题之间的交互影响尤为必要。

一 尝试回答“幸福感三问”: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

现有众多研究已经尝试对上述三个问题从理论和经验方面进行回答,虽然仍未出现唯一的公认答案,但也已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以问题一所

代表的“幸福感悖论”为起点，学者们通过比较幸福感和财富在短期及长期的关系，来确定是否存在不一致，即所谓的“悖论”。在验证悖论存在的前提下，提出可能的解释，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与收入不平等紧密相关的社会比较命题；在社会比较过程中，可能的参照群体不仅包括“显著的他者”，也包括个人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期望。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核心发现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1) 是否越富裕意味着越幸福？不一定，这取决于观察时间长短及幸福感测量。自伊斯特林于1974年提出“幸福感悖论”以来，众多实证研究基于不同社会的调查数据开始探寻国家财富与人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研究证实了“幸福感悖论”的存在，显示出幸福感和人均生产总值的变动趋势并不一致，经济增长并未带来幸福感的提升（Diener and Oishi, 2000; Easterlin, 1995; Kenny, 2005; Oswald, 1997）。随着长期追踪数据的可及性提高，以及统计方法的日趋完善，检验“幸福感悖论”的焦点落在了对于长期关系的分析上。近期一些研究使用较新的数据和更合适的模型，发现人均生产总值与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尽管有时是微弱相关（Sacks, Stevenson and Wolfers, 2013; Stevenson and Wolfers, 2008; Veenhoven and Vergunst, 2014; Veenhoven and Hagerty, 2006）。2010年，伊斯特林总结了持续近四十年的关于“悖论”的学术争论，提出已有研究中的不一致发现并未对“幸福感悖论”构成实质性的挑战，而主要来自数据和测量问题，具体而言：①称为“长期”的分析所使用的数据往往不够“长期”，他提出以十年作为一个经验性节点，而短于该长度的数据会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从而构成虚假的“长期相关性”；②幸福感测量的用语及回答顺序变动，发生在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相邻的两期数据中，题目顺序从先是“非常幸福”到“非常不幸福”，转变为随后的相反排序，从而导致表面上的幸福感波动（Easterlin et al., 2010）。在上文及随后的研究中，伊斯特林以更全面的资料及分析再次印证了“幸福感悖论”在世界多国的适用性（Easterlin et al., 2010; Easterlin, 2015）。

(2) 不平等一定会减损幸福感？不一定，取决于不平等发生的宏观背景及个人的参照群体的界定。已有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研究经济不平等对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宏观上，透过分析某一区域层面收入的



整体不平等水平（通常以基尼系数测量）对居住在其中的个体或居民整体幸福感的影响来判定不平等是否有负向作用。微观上，通过在个人幸福感模型中纳入其与参照群体相比的相对经济地位，来探究是否相对经济地位越低，个体幸福感也越低。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已有研究仍未达成一致认识。宏观层面上，尽管不少研究发现国家或地区的基尼系数和民众在相应层级的主观幸福感均值有显著的负向相关（Alesina, Tella and Macculloch, 2004; Hagerty, 2000; Morawetz, 1977; Oshio and Kobayashi, 2010, 2011; Schwarze and Härpfer, 2007; Verme, 2011; Winkelmann and Winkelmann, 2010），但仍然有不少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收入不平等与民众幸福感呈正向相关（Berg and Veenhoven, 2010; Knight, Lina and Gunatilaka, 2009; Rözer and Kraaykamp, 2013）。

微观层面上，大部分研究的发现支持了社会比较理论，即个人与其他参照群体比较的相对经济地位越高，个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官皓，2010；罗楚亮，2009；Card et al., 2012；Fliessbach et al., 2007；Kuhn et al., 2011；Luttmer, 2005）；然而，正如一些“例外”的研究结果所揭示的那样，相对经济地位对个人幸福感也可能产生正向影响。而造成这种异质性的因素可能包括：①所考察的社会的经济发展背景，在诸如俄罗斯及波兰等经济转型国家中，经济的快速变动以及难以预测性，会使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从“参照标准”转化为“个人未来收入信号”，从而产生不同的影响（Grosfeld and Senik, 2010；Senik, 2004）；②参照群体的界定范围，“例外”的结果主要来自与个人同住在较小范围（如街区）的参照群体，或是与个人有更亲密关系的参照群体构建出的相对经济地位研究（Kingdon and Knight, 2007；Mangyo and Park, 2011；Wolbring, Keuschnigg and Negele, 2011）。

（3）过去和未来对当前的幸福感评判是否有影响？确实如此。有学者已注意到主观幸福感评判的时间维度：人们的痛苦和快乐常常并非由直接体验而生成，而是通过回忆或预期，与过去和未来比较而产生（Elster and Loewenstein, 1992）。在多重参照群体框架下，考察相对经济地位对个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发现，与个人过去的“内部比较”的效应远超过与他人的“外部比较”的效应（Senik, 2004）。此外，参照群体的收入与个人

收入一样，也处在变动中，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参照坐标，而这种时间维度是考察相对经济地位的福利效应时不应该忽视的（D'Ambrosio and Frick, 2012）。

二 尝试回答“幸福感三问”：本书要回答什么？

本书旨在回答上述“幸福感三问”，通过梳理相关理论和既有文献，以全国代表性的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构建模型，估计效应，为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以及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提供经验证据。

第2章将尝试回答“是否越富裕意味着越幸福？”这一问题。我们将系统地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幸福感悖论”的理论争辩及经验证据，介绍回答这一问题所需的模型构建，并基于我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来检验该悖论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最后，我们将简要列举几个对于“幸福感悖论”的解释。

第3章至第6章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不平等一定会减损幸福感？”这一问题，我们将分别从宏观层面的收入不平等和微观层面的收入比较两个视角切入。第3章探讨不同地理层级定义的宏观的收入不平等与城乡居民的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根据不同层级收入不平等效应的异质性区分了“社会地位”原则和“社会距离”原则的适用性。第4、5章选取了日常生活中主要的两个情境，来分析在微观层面上，收入的社会比较过程如何形塑个人的幸福感。首先，在劳动力市场中，与不同的参照群体收入相比的相对经济地位是否以及如何对个人幸福感产生影响？这种在短时期内的相对收入效应如何被长期收入变动轨迹形塑？其次，在家庭内部，与配偶收入相比的相对地位如何影响个人幸福感？这种“家庭内部的比较”是否会受到个人性别意识形态的形塑？第6章以我国的乡城移民为对象，考察了研究社会比较时的一种可能的视角——多重参照群体的解释框架，具体检验了农民、其他农民工及流入地的城市就业居民作为潜在的参照群体，其平均收入影响乡城移民生活满意度的有效性。

与前面几章不同，第7章采取了动态视角，尝试回答“过去和未来对当前的幸福感评判是否有影响？”这一问题。基于2010~2016年四波个人层面的长期追踪数据，我们考察了包括收入增长在内的若干生命事件对于